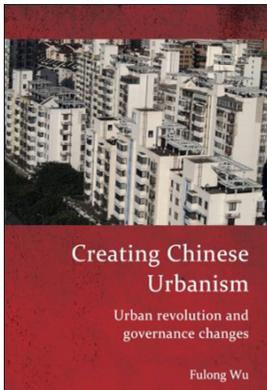


# 书评 | 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

## ——*Creating Chinese Urbanism: Urban revolution and governance changes* 导读



### 书籍作者

吴缚龙

出版社：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

下载网址（免费）：

[www.uclpress.co.uk/ChineseUrbanism](http://www.uclpress.co.uk/ChineseUrbanism)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城镇化浪潮的巨大冲击下，几千年来形成的“乡土中国”经历了深刻转型，传统固化的城乡二元体制和结构逐渐走向瓦解，“城市中国”多元特性并存的态势日益显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速度之快，涉及的人口规模、空间范围及影响程度之广世所罕见。这既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也不同于第三世界工业化明显滞后于城市化<sup>[1]</sup>，为世界城市研究带来了重大的理论挑战<sup>[2]</sup>。

该书作者吴缚龙教授现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规划学院，长期致力于推动城市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被誉为中国城市研究的世界级权威。吴教授最新力作*Creating Chinese Urbanism: Urban revolution and governance changes*（《创造中国城市主义：城市革命与治理变革》），是他基于对中国城市30余年细致观察和深度思考的学术研究结晶。该书以中国城市住区内的社会关系为线索，从住区尺度阐述了城市中国的形成，结合丰富的案例解读，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市场化对中国城市社会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城市及其基层治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变化，展现出当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异质性。

导论部分开宗明义，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出发，言简意赅地介绍了该书的创作背景。对中国社会及城市发展历程的回顾表明，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都处于较低水平的城市化阶段，中国社会——包括乡村和城市——一直以“乡土地缘”为主导，存在

着所谓“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特征。具体而言，封建社会时期，城市主要作为行政中心，商业活动较少；半殖民半封建时期，尽管城市文化出现了短暂繁荣，但中国城市依旧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结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城市得到一定发展，虽经历了政府主导的重工业化超前发展，但城市化相对滞后甚至止步不前；1978年的改革开放正式开启了中国的城市革命，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市场力量的引入与发展壮大引致了传统“差序格局”社会关系的变化。

主体部分包括5个章节，作者从“差序格局”的视角出发，通过案例展现了住区尺度的4种居住景观类型及其社会秩序与治理变革，勾勒出城市中国的形成和中国城市主义的浮现；并针对世界范围内城市研究领域的3个热点问题，即城市的本质、城市是一种集合形式还是一种拼装形式、城市理论的特殊性或一般性，透析中国城市研究如何成为城市理论国际舞台的焦点。

第一章概述了中国正持续变化的居住景观，揭示出由4种类型住区组成的新城市社会地理。换句话说，由传统街坊社区和单位大院组成的二元住区结构，在市场化改革，尤其是住房商品化改革的推动下，扩展为四元结构，出现了外来农民工群体居住的城中村和中产阶级居住的封闭住区两种新的住区类型。这揭示出由于住房产权的差异和住区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国城市的居住分异和多样性进一步强化，即4类住区呈现出各自独特的居住动态和治理变化，中国城市的居住景观由此改变，并催生出新的中国城市主义。日渐深入的市场化进程最终终结了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的有机秩序，更强异质性、表面性和多样性的社会关系逐步显现。

第二章聚焦于传统街坊住区和单位大院的转变或消失，揭示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新）传统主义”的终结。作者指出，传统街坊住区和单位大院的变化不仅表现为物理形态的变化，更体现了中国“有机”和“整体化”社会（totalised society）的逐步瓦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传统街坊住区由私人住房转变为公共住房，但其紧密的邻里关系仍得以留存；改革开放之后，原住民逐渐从老旧的传统街坊住区搬迁至环境品质较好的封闭住区，而这些老旧住区由于租金低廉成为外来人口的落脚点，内部原有的邻里关系逐渐消失。单位大院是20世纪50年代政府在工业区附近建成的集体住区，因其公共住房的属性而被称为“新传统主义”住区。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

## 书评作者

魏宗财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博士,副教授, weizongcai@scut.edu.cn

唐琦婧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硕士研究生

黄伟超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硕士研究生

于传统街坊住区和单位大院普遍面临居住环境衰败与改造资金短缺等问题,政府引入市场力量对其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与重建,如北京菊儿胡同、南池子和南锣鼓巷,上海新天地,广州永庆坊等。此外,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单位组织具有独立性、封闭性等非现代性特征,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城市基层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市场化背景下的复杂局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单位对住区社会生活管理的职能逐步让位于城市行政管理机构,单位大院治理经历了从单位组织作为主体逐渐向社会、政府、市场多元主体参与的转变过程<sup>[3]</sup>。21世纪以来,随着社区建设运动和近年来的网格化管理,住区治理更加专业化,呈现出更加行政化的政府—社会关系。乡土中国社会的本质逐步转型,社会福利得以重新分配。

第三章阐述了城中村(一种针对外来农民工群体的新型住区)的形成背景、社会关系和邻里互动及治理形式。城中村是脱胎于城市附近原有乡村的非正规住区,是中国半城市化的产物,体现了中国传统乡村集体主义的逐渐消失。由于其低廉的租住成本,城中村成为进城农民工群体的主要居住地。从社会关系和邻里互动的角度,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农民工群体虽具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但仍存在如串门与互相帮助等较频繁的交往,这些交往活动强化了他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然而从治理的角度,城中村的治(管)理主体最显著的变化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队转变为股份制合作社或经济联合社,这种转变导致传统乡村集体主义的逐步消失,一种基于产权而非有机社会契约的新道德秩序正逐步建立。这种以产权为基础的制度将外来农民工群体排除在城中村治理事务之外,导致他们难以真正融入所在社区及更广阔的城市社会。作者在章末总结道,城中村存在着如土地所有权分散、土地管理松散、村庄未被城市公共服务覆盖,以及由村民自组织日常维护等“非正规性”特征。这一方面表明城中村仍留存着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另一方面也映射出住房商品化改革冲击下传统社会所衍生出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模式,创新性地提出城中村是一个正在消失的传统主义的典范,“整体化”社会面临解体。

第四章聚焦于中产阶级居住的封闭住区,阐释了其产生与发展过程、建成环境及治理特征,以及居民的生活状态。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社会转型的纵深展开,中国住区构成在住房制度改革背景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封闭住区因满足了中产阶级对更多的个人隐私以及

更高品质的住房和建成环境的追求,而成为住区建造的主流形式,其实是开发商创造出的一种消费产品。从治理角度来看,中国的封闭住区与西方存在显著不同,突出表现为治理结构相对复杂,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分别是代表政府、社会和市场的三股力量。尽管业主委员会的发展对中国传统的住区治理模式带来了一定程度冲击,但目前其存在成立比例不高、经费来源受限、业主参与意识不足等问题,仍处于成长期<sup>[4]</sup>。总体而言,当前中国封闭住区的自治程度仍然有限,市民社会团体发展还不够成熟。从社会关系与居民生活的角度来看,尽管封闭住区居民间的交往与互动较少,但他们却表现出强烈的地方依恋。这种地方依恋并非基于由“关系”定义的熟人社会,而是基于住区居民作为“有房者”的共同利益。封闭住区的兴起和发展壮大反映出,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基础正逐步瓦解。

第五章概括提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住区的发展与变迁,并就城市研究领域的3个热点问题——城市的本质、城市是一种集合形式还是拼装形式、城市理论的特殊性或一般性——进行了中国语境下的学术讨论。既有对城市本质的理解往往将其视为经济集聚的结果,而对于其中社会和政治驱动因素的关注较少;该书通过4类城市住区和其中的社会关系来阐释中国城市主义,揭示出传统“差序格局”模式的瓦解和治理模式的变化。关于城市是集合形式还是拼装形式的讨论,实则是探讨“urban”和“city”的差异,前者代表了一种过程、趋势及社会关系的集合,后者则被视为一个有界的地理概念;该书透过住区尺度社会关系的多维差异化过程,辨析和探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物质形态及社会结构特征的转变。对于城市理论的特殊性与一般性讨论,该书虽聚焦在中国这一特定历史地理语境,描绘了从中国传统乡村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主义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城市主义的变革,但作者将比较研究的思维贯穿始终,为深层次阐明中国城市主义提供了一个创新性的分析框架。

结语章节提要钩玄,作者认为,与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特有的“差序格局”相比,如今城市中国的“差序”(关系)依然存在,而“格局”(模式或秩序)已然消亡。聚焦于不同类型住区,该书将持续变化的城市住区与中国乡村以及改革开放之前的单位大院和传统街坊住区作对比,揭示出在市场化进程的持续推动下,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乡土情结和差序格局日渐式微,创新地提出了与强调整体化社会的集体主义截然不同的,具有多样性、不平等性和私人性特征的中国城市主义。进

一步地,中国城市呈现出个人从以前由“差序格局”所表征的集体主义中脱离出来的态势;但作者也指出,私人治理和市民社会并未随着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建立起来,反而是行政力量对城市基层的治理作用逐步加强。

纵观全书,笔者认为主要有3个鲜明特色与创新。其一,研究视角创新。国内有关城市化的研究成果多聚焦城镇人口变化、城市化水平和速度、城市化动力机制等方面<sup>[5]</sup>,而该书以社会关系变化为视角,洞察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城市革命,深刻探讨了住区尺度的社会变革如何创造出更加宏观和制度层次的政治影响。其二,研究方法创新。作者使用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住区社会关系与治理变革的实证案例,有效衔接了城市理论的特殊性与一般性,即聚焦于中国城市化的具体历史地理语境,强调使用“比较的姿态”(comparative gesture)以凸显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特征,展现了城市理论建构的有效途径,这远非简单、直接套用西方城市理论。其三,写作风格简洁明朗。该书用语明白晓畅、深入浅出,可读性较强。为精准传达某些术语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含义,作者采取先用英文术语,再辅以汉语拼音补充的方式,确保了该书与国际学术界研究对话的有效和顺畅。

该书揭示了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变革的总体特征,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城市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复杂多样,其区域差异以及更多新的住区类型等有必要囊括在内探讨。该书所研究的案例多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但由于资源禀赋、人文历史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外向开放模式等方面的差异,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及城市化进程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现象<sup>[6-7]</sup>。因此,中西部地区及中小城市城市化进程是否与该书重点关注的东部沿海超大城市相似,还有待探究。此外,中国政府针对城市中低收入、外来农民工群体的住房保障体系正不断完善,其主导建设的保障房住区、保障性租赁住区等新类型的住区持续涌现,这些住区内的社会关系、治理形式等与普通封闭住区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将这些新型住区囊括在内,以更全面地描绘中国城市主义的画卷。

综上,该著作从住区尺度的社会关系切入,通过透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变化,为诠释中国正出现的新型国家—社会—空间关系建构了一个有创见的、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框架,对中国乃至全球城市主义的发展与完善具有开创性贡献;同时,该书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参考。

## 参考文献

- [1] 顾朝林. 城市化的国际研究[J]. 城市规划, 2003(6): 19-24.  
GU Chaolin. Urbanization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pproach[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3(6): 19-24.
- [2] WU F, ZHANG F. Rethinking China's urban governance: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neighbourhoods, cities and region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22, 46(3): 775-797.
- [3] 毛子丹, 柴彦威. 中国城市单位社区治理模式转型路径及其未来趋势——以北京市毛纺南社区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3, 20(3): 17-22.  
MAO Zidan, CHAI Yanwei. The evolution and direc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s Danwei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Maofangnan Community, Beijing[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3, 20(3): 17-22.
- [4] 何深静, 汪坤. 广州商住小区业委会发展特征、治理效能及其影响因素[J]. 热带地理, 2015, 35(4): 471-480.  
HE Shenjing, WANG Kun. Homeowner association in Guangzhou's gated communities: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governance efficacy and its determinants[J]. Tropical Geography, 2015, 35(4): 471-480.
- [5] 顾朝林, 吴莉娅. 中国城市化研究主要成果综述[J]. 城市问题, 2008, 161(12): 2-12.  
GU Chaolin, WU Liya. Review on major studies on urbanization in China[J]. Urban Problems, 2008, 161(12): 2-12.
- [6] 王开泳, 邓羽. 新型城镇化能否突破“胡焕庸线”:兼论“胡焕庸线”的地理学内涵[J]. 地理研究, 2016, 35(5): 825-835.  
WANG Kaiyong, DENG Yu. Can new urbanization break through the Hu Huanyong Line?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geograph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Hu Huanyong Lin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5): 825-835.
- [7] 宋周莺, 祝巧玲. 中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格局及其驱动力[J]. 地理学报, 2020, 75(8): 1603-1616.  
SONG Zhouying, ZHU Qiaoling.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driving force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s border area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8): 1603-1616.